

『中國民主同盟』內幕（一）

王覺源

「中外雜誌」發行人王成聖教授，以余曾參與對日抗戰時期「處理黨派」的工作，要我寫一點有關中國近代黨派的文章。我亦深深覺得：中國過去搞政黨政治，已造成前後兩次「黨派誤國」的歷史紀錄：一為民國初年的黨派，大都成了官僚、政客、軍閥禍國殃民的工具。一為對日抗戰時期的黨派，大都作了中國共產黨叛國作亂的幫兇。前者，暫且不說。後者，中共固為罪魁禍首，中國民主同盟助紂為虐，實其主要從犯。來台以後，論者清算舊帳，指責中共的文章特多，批判民盟的作品，却很少見。我這篇文章，祇因文字資料太少，大半都是憑着記憶而來的。雖有白頭宮女話開元故事的意味，明日黃花，無甚價值；但為研究歷史，記取歷史教訓，亦未嘗無所藉助耳。

抗戰時期黨派蠭起

(一) 幕內『民主同盟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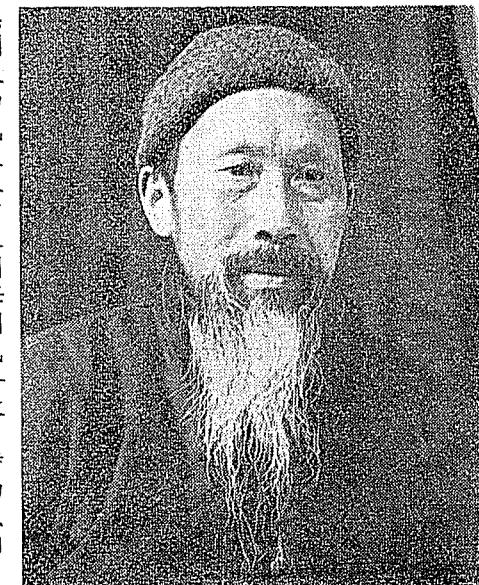
中國全面抗日戰爭發生以後，政府為團結國力，力求民主，開放黨禁。一時各政治黨派，乘機興起。其情形之混亂複雜，實有甚於民國初年。北洋政府時代，政黨全為國會議員所獨佔，各黨中均無非議員之黨員。二、三人一黨，四、五人一派，黨派不下百數。迨袁世凱迫令國會停閉，以迄段祺瑞執政，集總統、國會、內閣大權於一身以後，樹倒猢猻散，中國北方的政黨，幾全歸於消滅。抗戰時期的政黨，所不同於北洋時代者，即政黨沒有國會作憑藉。各依其舊有勢力與特殊關係，起而組織之大小政團，據調查統計，總數亦不下二百。即當時浮現於社會上政海中的人物，幾乎無人不黨，無人不派，甚至一人而跨

數黨者，亦不足為怪。其無黨無派的所謂社會賢達或民主人士，反而不啻鳳毛麟角。

這時大小黨派林立，大都勢力薄弱，作用無多。除具有悠久歷史與遠大政治理想，領導抗戰建國的中國國民黨外；中國國家社會黨（後改民主社會黨）與中國青年黨，雖各有其民主憲政的理想與政綱政策，然皆實力不足；再就是剛向政府投誠，願意服從政府領導，仍然野心未泯，陰謀方張的中國共產黨（以下簡稱中共）。其他許多黨派，則頗多失意的官僚、政客、舊軍人、文人學士大夫階級、工商界人士、幫會份子與地方紳耆，利作投身政治，獵取名利權位的工具。言其組織，則若有若無，有亦不堅實。至於政見主張，大多雷同或空泛不切實際。尤其宗旨，毫不固定，朝三暮四，常令人有不可捉摸之感，這些小黨小派產生之原因，自然與時代環境有關。一為執

政黨團結抗戰力量，準備實行民主憲政，大開黨禁。次為失意的官僚政客與野心投機份子，藉組政黨，乘機登上政治舞台，以遂其政治目的。三為中國共產黨，推波助浪，號召國人參加政治活動，並唆使與資助製造黨派，向執政黨進行鬥爭。在如此環境推動之下，於是組黨立派之風，乃盛極一時。

自民國十六年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，舉行清黨反共，以迄對日抗戰。在這十年之中，一方努力訓政建設，一方積極搗亂破壞，始終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兩黨對立的局面。共產黨掙扎十年，幾瀕消滅。經過西安事變與抗戰機會，中共乃向政府投降，發表諭誠宣言：保證停止武裝暴動；停止沒收土地；取銷紅軍和蘇維埃；服從政府命令。政府為集中民族力量以抗日，亦寬恕中共既往，放棄剿匪政策，領導中共共赴國難。中共才渡



得了偷生復活的機會。中共向政府之投誠，原是虛偽的欺詐的，並未真正放下屠刀，擯棄叛國作亂的陰謀。其與國民黨的關係，亦始終貌合神離，經常發生磨擦。故經時未久，中共不但違背了誓信旦旦的諾言，更否定了國家民族的利益，以怨報德，進行以「消滅國民黨，奪取政權」為目的陰謀。藉抗日之名，乘機割據地盤，擴充軍隊；勾結敵軍，消滅友軍。一方壯大自己；一方則削弱政府與國民黨，又儼然成了中國一個大政黨，與國民黨公然對立稱雄起來了。

在國共兩大黨對立情形之下，其他各黨各派，在國共兩黨夾縫中的態度，大體言之，約有五類：1. 反共的。為增加自己的聲勢，利用中共於一時則可；如受中共的操縱指揮則不願。2. 親共的。最初意在挾中共以自重，好向執政黨進行敲

詐勒索，終被中共扼住了咽喉，不得不向中共投奔。3. 反對國民黨的。本仇視或忌嫉執政黨的心理，大有寧為玉碎，毋望瓦全，逞快一時的態度。4. 傾向國民黨的。既不甘附共，但擁護執政黨，又是有條件的，分配給其黨派以政府或民意機關若干席位。5. 灰色的。祇有現實利益，沒有政治是非之輩，勾結稱黨，誰願收養，就跟誰走。簡言之，當時各小黨派的態度，雖有五類，實則絕大多數是反國民黨的；極少部份則為有條件的同情國民黨。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，利用混水摸魚的機會，「矛頭針對國民黨，分割執政黨的權利」！初為參政會與政協會議，繼為中央民意代表與政府重要職位。一方各欲利用中共以自重，結果皆落入中共的圈套；一方又欲各黨聯盟，造成中國第三大黨。後來的中國民主同盟，就是如此醞釀出來的。

黨派發展千奇百怪

中國近代的政治黨派，是隨中國對日抗戰而忽然的凌空的蓬勃興起來的。雖或真為時代環境所使而然；但吾人總覺與現代實行政黨政治國家的政黨，顯有偏差，未循政黨發展的正軌。不獨抗戰時期的黨派如此，民初北洋時代的政黨，亦復如此。這種偏差，即美英國家的政黨，都是受人民領導的。而中國民初與抗戰時期的黨派，却是要領導人民的。這自然是由於經濟能力、教育程度及社會組織各方面的差殊。然也不是說，中國

的政治黨派，完全不受人民的領導；但就實際來講，在民主政治發展的初期，政黨對人民的領導，實多於人民對政黨的領導。中國的政治黨派，既有領導人民的責任，那黨派的負擔，便還之而加重了。換言之，人民對於政治黨派，既還沒有充分發揮監督的能力，那政黨的本身，便須有自我監督的能力。然而辛亥革命以後，中國的政治黨派，竟不能走上政黨政治的常軌，竟不能藉議會制度，完成立憲，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。其主要原因，即在黨派本身的自私、自利、腐敗、墮落，沒有道德的操守。不能領導人民，更放棄了自我監督的責任。自民國初年正式成立國會至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前，北洋政府時代，大小政治黨派，先後不下數百。除國民黨之外，其較著者，前後有共和黨、進步黨、統一黨、民主黨以及政學系、研究系、交通系、安福系等黨派。在最初，各黨派尚能為其政綱而致力，為立憲而呼號，為主張而論戰，為民意而前奔，亦略具歐美政黨政治的形象。隨之，各黨派由政治理想的結合，一變而為私人朋黨的結合，或狼狽為奸，或互相利用。由領導人民，變為忽視人民，出賣人民。不但擾攘十多年，沒有見到憲政的影子，連一部憲法，都沒有制定出來。甚且由維護立憲，變為毀法亂紀，投靠軍閥。直皖戰爭以後，竟公開受賄選舉總統，政黨更成了財閥軍閥的御用品。終使段祺瑞說：「政黨成了歷史的陳跡」，而行集總統、國會、內閣於一身的大獨裁。至此所謂政黨，在北方實亡而名亦不存了。

(一) 蔽內『盟同主民國中』

政黨政治，由於國民參政會及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，與國大及立、監兩院的選舉，一時各黨派亦應運而新生或復活起來。這自然不能不歸功於中國國民黨，領導國民革命的成功，及由訓政完成準備實行憲政的鼓勵，亦國際民主潮流所趨，人民厭亂求治——尤冀共產黨之能停止叛國作亂！皆為中國不能不走向民主道路的理由。在這種趨勢之下，國民黨誠意放棄以黨治國而實施憲政，乃是必然的。共產黨如繼行作亂叛國，自不容於國人，成爲國人皆曰可殺的對象。國民黨的誠意，既得不到共產黨的贊同接受，各黨各派反而接受了共產黨的鼓動作其統戰工具，以抵抗國民黨「民主憲政」之實施。那國人所希望於政黨政治者爲何？所期於各黨各派者爲何？中國國民革命的目的，簡言之，就是實行「民主憲政」。自民國二十五年公布「五五憲草」，以迄召開國民大會、公布憲法，十年的艱苦奮鬥，得來誠屬不易。不料民主憲政行將實施之際，因顧國家民族利益的共產黨，提出反對，自屬意料中事。却不知以標榜民主（以民主作其黨名），以「實施憲政」作主要政見的民主同盟與其他黨派，竟然一犬吠影，百犬吠聲，附和中共，公然反對國民大會、反對民主憲法。這與歐美的政黨，實在偏差尤甚！

再演一次黨派誤國

抗戰建國時期，乃中國政黨派最活躍的時期。所有新興的黨派，原各有其無限的發展前途！各黨派要珍重其前途，發展其前途，其本身除重視組織、訓練之外，必須重視道德！有主義、有理想、得民心、孚重望、有風度、有氣節。尤不能再蹈北洋時代政黨之覆轍；專門投機取巧、因緣附勢、左顧右盼、出賣自身、出賣羣衆，招致「黨派誤國」之譏，被國人所共棄。但抗戰時期的政治黨派，除國民黨具有悠久歷史以外，其他各黨各派，實都比較幼稚，組織未固，經驗不足。此時的共產黨，表面雖已改邪歸正，與國民黨合作，實際仍未脫離流寇生涯，放棄叛亂作風。當時國人的觀感，固共許國民黨而非共產黨。自然也更希望國民黨能進益求進，真正成爲全民的政黨，也期待共產黨能澈底改弦更張，真正成爲國民黨的友黨，精誠合作。共爲抗戰建國與民主憲政而努力！

但其他黨派，在此情況之下，却大有爭取民心和政治領導權的機會。特別是由各黨派所聯合的「民主同盟」，已具有第三大黨的粗形更有爲。縱令共產黨真能從此放棄邪惡偏見，而與國民黨合作無間，保持兩大政黨的地位，縱令

一個政治黨派的組成，主要的是以實現與推行其政見主張爲目的。某一黨派，如無政見主張，或其政見主張與其他黨派雷同，便無單獨存在之必要。在此情形之下，政見主張相同，性質相若之若干小黨派，爲集結力量，以貫澈其目的，聯合組織爲一個較大的政黨，乃是一個好主意。在推行政黨政治來說，也是一種好現象。中國抗戰時期的中國民主同盟，就是由當時若干黨派聯合而來的。

提到中國民主同盟，這是三十年以前，在中國紅得發紫透黑的黨派。其組織形成，醞釀很久，最初叫做「抗戰建國同志會」，經過三番四次的更改，才正式定名爲「中國民主同盟」。它的醞釀形成，是經過了幾個階段。民國二十七年七月，政府爲着抗戰建國大業，需要團結國力，意志集中，力量集中！在武漢成立「國民參政會」，延攬各黨各派人士、社會賢達、學者專家，聚集一堂，共謀國是。由於政府的號召與延攬，國內外各黨派人士，因而獲得聯繫的機會。一個黨派的組成，自然是有所目的企圖的。當時各黨派的目

己的政見主張，拋棄政黨發展的正道，採取短視的投機取巧主義，不顧政治操守，背棄人民的權利，甘心獻媚賣笑，爲叛亂黨派之野心，陰謀跑龍套，作應聲蟲，再演一次「黨派誤國」的悲劇。這又是我們再度爲中國政治黨派，深感遺憾的事！爲我國家民族的前途，最大希望，則唯有寄於中國國民黨與民、青兩黨而已！

黨派聯盟醞釀經過

(一) 幕內『盟同主民國中』

的企圖，不但未如政府所要求者，努力切實以赴。反而藉口貫澈實行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，所通過的「抗戰建國綱領」，聯合組織「抗戰建國同志會」，展開在野黨派的團結合作。對政府有所要求，採取一致的態度與行動。這就是中國黨派聯盟的第一階段。

二十七年十月，中國對日抗戰作戰略上的撤退，放棄了武漢。同時，本來偽裝投誠政府的中國共產黨，陰謀異志，也開始顯露。於是國共兩黨的磨擦，亦日甚一日。抗戰建國同志會，因此高調國共兩黨，不可分裂，以統一建國為號召。欲以第三者自居，折衝於兩黨之間，以抬高其政治地位！因復改組抗戰建國同志會，為「統一建國同志會」。通過並發表所謂信約十二條（見後）。



三十年春季，新四軍（共匪改編的）叛變事件發生。這祇是新四軍違抗軍令，破壞紀綱的事。繩之以國法，即可。而「統一建國同志會」，則固為誇張渲染，藉口團結統一，奔走於國共兩黨之間。表面從中調和，協調國共兩黨的關係。其實一則向中共暗送秋波，企圖勾結；二則推波助浪，企圖混水摸魚。統一建國同志會，從此便有進一步的企圖，將該會改組為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」的醞釀。不過迄未有公開組織的舉動。直至是年十月十日，忽在香港「光明報」正式刊載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」的啓事，宣佈該盟業已經在重慶正式成立（實際是在香港組成）。並發表宣言及對時局主張、政治綱要。這便是中國黨派聯盟的第三階段。其政見主張與企圖目的，顯較前兩階段又進了一步。參加該盟的份子，除有所謂三黨三派外，從這階段開始，中共亦以個別份子，秘密打入該盟，從事黨團活動。該盟當時以香港為根據地，以重慶、昆明、成都為其活動重點，互相呼應。三十一年十一月，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，在重慶開會時，該盟企圖透過參政會，實現其政治主張。曾提出所謂十大提案。國民參政會主席團，認為這所謂十大提案，不獨無補時艱，反足以「破壞抗戰，動搖國本」。全部予以保留未付討論。該盟經

），其政見主張，顯較前階段又急進了一步。這是中國黨派聯盟的第二階段。在這兩階段中，中共份子雖還沒有滲透進來；但發動組織，中共則不無暗中策動鼓勵的活動。

三十年春季，新四軍（共匪改編的）叛變事件發生。這祇是新四軍違抗軍令，破壞紀綱的事。繩之以國法，即可。而「統一建國同志會」，則固為誇張渲染，藉口團結統一，奔走於國共兩黨之間。表面從中調和，協調國共兩黨的關係。其實一則向中共暗送秋波，企圖勾結；二則推波助浪，企圖混水摸魚。統一建國同志會，從此便有進一步的企圖，將該會改組為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」的醞釀。不過迄未有公開組織的舉動。直至是年十月十日，忽在香港「光明報」正式刊載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」的啓事，宣佈該盟業已已經在重慶正式成立（實際是在香港組成）。並發表宣言及對時局主張、政治綱要。這便是中國黨派聯盟的第三階段。其政見主張與企圖目的，顯較前兩階段又進了一步。參加該盟的份子，除有所謂三黨三派外，從這階段開始，中共亦以個別份子，秘密打入該盟，從事黨團活動。該盟當時以香港為根據地，以重慶、昆明、成都為其活動重點，互相呼應。三十一年十一月，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，在重慶開會時，該盟企圖透過參政會，實現其政治主張。曾提出所謂十大提案。國民參政會主席團，認為這所謂十大提案，不獨無補時艱，反足以「破壞抗戰，動搖國本」。全部予以保留未付討論。該盟經

隨亦淪陷於日本。中國民主政團同盟，原以香港為根據地。至此，該盟便活動失據。其首要份子，亦星散各處，盟務乃趨於消沉。此時中共，正欲利用「民主自由」、「實行憲政」為餽，爭取各黨各派的同情，遂行其所謂「統一戰線」的陰謀。即認中國民主政團同盟，雖已形同瓦解；但盟中原有份子，失望之餘，多無歸宿，仍有剩餘價值可以利用。中共周恩來輩，乃祕密策動素與中共接近的章伯鈞、沈鈞儒等，復聯絡該盟中之各黨派，重起恢復活動。原屬該盟的各黨派，以有中共出面撐腰協助，亦皆樂予接受。這是中共積極利用與控制各黨派的開始；也是中國黨派聯盟真正受制，成為中共工具的開始。

當中共周恩來與章伯鈞、沈鈞儒等商討之初。中共深覺民主政團同盟，受了「政團」二字的拘束，僅能以團體參加，而不能擴大吸收個人盟員。中共自命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大政黨，該盟復須避免共產色彩，自不能以共黨名義加盟。同時，中共既欲該盟以第三者的姿態出現，復欲其黨徒祕密滲透，以黨團活動方式，深入控制，使該盟成為中共的第五縱隊。因此關於「應否准許個人份子參加」的問題，經過多次的討論，才如中共的意見，作了決定。

青年黨領袖之一左舜生曾任民盟總秘書代理主席。因不滿民盟親共派替中共搖旗吶喊而退出民盟。

(一) 幕內『盟同主民國中』

該盟終於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九日，在重慶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。出席者計有：中國國家社會黨、中國青年黨（兩黨未久即退出，見後）、第三黨、救國會派、鄉建派、職教派及所謂無黨無派的民主人士的代表五十四人。決議擴大組織及取銷「政團」二字，改名為「中國民主同盟」（以下簡稱為「民盟」）。這應是中國黨派聯盟的第四階段了。大會除通過「民主同盟對抗戰最後階段的政治主張」發表外（見後），並推選張瀾為民盟主席。選出中央執行委員三十三人，常務委員十三人。設立各種委員會。建立各省縣市總支分部，中共份子，一時入盟者更多。中共周恩來，且成了民盟活動半公開的實際的指導者。民盟改組佈署既定，即在全國各地積極展開宣傳。



政見主張逐漸變質

中國各黨派聯盟，由「抗戰建國同志會」到「中國民主同盟」。名稱雖經數次變更，參加的政治團，却無大異。惟其政見主張，則步步提升了由平調而高調，由抽象溫和而具體急進，而與中共看齊。聲應氣求，終於反對國民大會、反對憲法，而與中共同流合污，走向叛國作亂之路，終於見棄於國人，不得不自動宣佈解散。茲就其在各階段中所持之政見主張，分而觀之：

民盟在「抗戰建國同志會」階段中的政治主張：「貫徹實行抗戰建國綱領」。這是在野黨派企圖聯合的起步。以團結各黨派，共為抗戰建國而致力，以迎合政府和國民心理，不但是溫和的，而且是合理的，應當的。誰能敢說不應該？但黨派聯盟，不外充實政爭的力量，且為國民黨執政以來所初見。執政黨的態度如何？不能沒有試探。藉投石問路的方法，測量執政黨的反應，才能決定應採的行動方針。

民盟在「統一建國同志會」階段中，信約十二條，主張：「各黨派一律以平等地位，公開存在，意志集中，共同努力，以求國家之統一」。這在政黨政治理論上講，固是合理的，也是執政黨所已許可的；但從現實情況講，統一建國同志會這政見主張，動機並不光明磊落。因為武漢棄守，正是政府抗戰艱困之際。中共又急圖乘機而起，加深政

府的困擾，以遂其陰謀野心。各黨派竟不顧大義，在中共唆使之下，罔顧民族存亡，更乘國家之危，向執政黨作進一步的要挾！實不啻要各黨派，無論良莠，都能在平等、公開、合法的地位上，且能展開絕對自由的活動。雖搗亂、破壞，政府不能干涉，法律不宜禁止一樣。民盟在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」階段中，發表對時局主張的政治綱領，內容大要為：「貫徹抗日主張，反對中途妥協。實施憲政，結束黨治。保障人民生命、財產、身體、思想、集會、結社之自由。反對一切非法之特殊處置」。這是由於中共已有許多「違抗軍令、政令，破壞抗戰建國、叛逃日益顯著」的非法事實存在。政府為國家民族前途計，便不得不整飭紀綱、制裁不法。該盟如此主張，則直成了中共的幫兇，同時國共兩黨，這時已由暗而明，衝突不已。該盟在中共煽動之下，即妄想以第三大黨的姿態出現，折衝於兩黨之間。要求執政黨放棄根據三民主義與抗戰建國綱領「以黨治國」的責任，而讓名由各黨派聯合執政，實由中共來獨裁執政。這對執政黨的要求，可說又跨上了一大步。因為前階段，僅希望各黨派，能與執政黨平等的公開的活動。現階段則要求執政黨，結束一黨黨治，使各黨派在政權上平分秋色。

民主同盟正式成立的階段，所提政見主張：「結束一黨專政，建立各黨各派聯合政權。貫徹加強對英、美、蘇等各盟邦之聯繫」。由於政府顧全國大局，對於中共種種不法行為，一再容忍。因使中共勢力，日益坐大。這從民盟各階段

(一) 幕內『盟同主民國中』

所提節節高升的政見行情，亦可測見。民盟以有中共的依恃，便挾中共以自重，向政府便步步逼進，不但要求結束黨治，且要求建立各黨各派的聯合政權，以替代國民黨的政府。這政見並不新鮮，中共叛國作亂，在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這階段中，所擬定的革命路線，就是「轉變民主革命，為社會革命；建立聯合政府，轉變為新民主主義共和國。」民盟現階段的政見主張，直可說是中共革命政策路線的翻版毫釐不差。

民青兩黨為何退盟

中國民主同盟的組成，號稱三黨三派，與所謂無黨無派的「民主人士」。份子至為複雜，可謂集失意官僚政客、無聊文人及野心人物之大成。基於共同的利害關係而結合。自因政見不同、權利衝突而分裂。幾可說民盟成立之日，即是民盟分裂之時。最基本的原因，就是思想上的反共，親共思想與反共思想之無可能調和。首先宣佈退盟者，就是青年黨，繼之則為國社黨（以後改稱民主社會黨）。中國青年黨一貫的政策，就是反共。該黨自民國十二年，曾琦、李璜、左舜生諸先生，在巴黎組織「國家主義青年團」開始與「共產黨旅法支部」，在思想上就是對立鬥爭的。直至抗戰時期，各黨派成立聯盟之時，仍未改變其一貫的思想主張。故民盟成立伊始，即有反共派與親共派的暗爭。而鬥爭爆發的近因；則由於青年黨為民盟中的最大政黨，該黨領袖之一的左舜生先生，因得被推為民盟的總祕書。總祕書總攬民盟一切大權（左氏並代理民盟主席職權），致引起盟中親共派的不滿。民國三十四年十月

一日，民盟在重慶召開臨全大會時，親共派積極展開活動，遂削去了總祕書代理主席的職權。因使青年黨在民盟中的地位，一落千丈。青年黨早已不滿民盟一味附和中共的政策，久有退盟之意。祇因未得適當機會。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前，青年黨乃決計單獨向政府提出代表名單，展開退盟的實際行動。從此雙方態度，更趨惡化。青年黨攻擊民盟親共派「為中共之尾巴，自己無一貫主張，完全以中共態度為轉移，專門替中共搖旗吶喊」。並對羅隆基等，頗多諷刺。羅隆基等，則誣青年黨被政府收買，「無在野黨風度，公然變成執政黨的喇叭」。章伯鈞則罵青年黨「不倫不類，時而與中共合作，時而與國民黨搞手，實無政黨資格」。雙方攻擊，愈演愈烈。青年黨終於不宣而退出民盟，使民盟頓失了一根有力支柱。左舜生先生，原名學訓，號仲華，湖南長沙人。（一八九三—一九六四），早歲留法，亦「國家主義青年團」首創人之一。剛強明智，嫉惡如仇。曾主編該黨「醒獅周報」深為世人所重視。抗戰初起時，在武漢即代表青年黨上書蔣委員長，擁護國民黨與抗戰建國綱領。後來之退出民盟，故決非偶然之事。

中國國家社會黨的領袖張君勸先生，在清末民初，即已從事憲政運動。張君勸先生，又名嘉森，字士林，號立斋，江蘇寶山人，（一八八七年生，一九六九年卒於美國）。他是清季舉人。早歲留學德國，民元發起組織共和建設討論會，憲運動的前輩。在北大教書多年。抗戰之前，在

廣東創辦「學海書院」；在雲南大理創辦「民族文化學院」。是一個純粹的學者，著作亦很多。抗戰之初，即上書蔣委員長，竭誠表示擁護的態度，他雖是一個學者，是一個大學教授；學而優則仕，亦一極熱衷於政治的人。

國家社會黨，民國二十四年成立於北京。張氏即以其所著「立國之道」一書，作為組黨的理論基礎。故其政綱，乃「絕對的國家主義與進步的民主政治」。其政見主張，自與共產黨的「國際主義及無產階級專政」，根本不能相容。當其與各黨派聯盟之初，亦由於該盟尚未遭到共產思想的侵襲與親共派的破壞。及卅四年張君勸先生由美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會議歸來。目睹親共派處處操縱民盟，深表不滿。感到側身民盟，決非久計。故於政協會議之後，即極力整頓該黨內部；並着手籌備與海外民主憲政黨之合併事宜。兩黨決定合作後，三十五年八月，即正式宣佈改組為「民主社會黨」。當時並聲明，僅與民盟保持聯盟關係，絕不妨礙其獨立活動。即為該黨退出民盟之先聲。民主社會黨成立之前一月（七月）國民政府蔣中正主席電召張君勸先生前往廬山。民盟親共派，已知張氏對政府之傾向，更趨積極。羅隆基等則大進說詞，企圖挽回張氏去志。當遭張氏拒絕。因之，轉而諷刺張氏為「曾琦第二」。民盟的機關報——文匯報，對張氏之攻擊，尤不遺餘力。十一月，國民大會召開於南京，民社黨乃毅然宣佈：「無武裝、無地盤，不能捨民主之路；有主義、有政綱，不如獨立為得計」；而脫離了民盟的羈絆。從此民盟兩大支柱，則全摧折了。